

流动的 家园

丁未 著

MOBILE HOMELANDS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ty Practices of
the "You County Cab Driver Vill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
身份共同体研究

流动的 家园

MOBILE HOMELANDS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ty Practices of
the "You County Cab Driver Village"

“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
身份共同体研究

丁未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动的家園：“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
研究/丁未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097-5502-0

I. ①流… II. ①丁… III. ①流动人口-研究-中国
IV. ①C9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1227号

流动的家園：“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

著 者 / 丁 未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分社 (010) 59367127 责任编辑 / 于占杰 任文武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责任校对 / 李文明

项目统筹 / 郭 峰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4.75

版 次 / 2014年3月第1版

字 数 / 335千字

印 次 /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502-0

定 价 / 89.00元

吴，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本书系广东省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批准号：
06JDXM86001）的最终成果。

序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关于都市“流动家园”
现象学式的传播考察

李金铨

(一)

传播研究最早发源于美国，历史很短。美式的传播研究如今仍有“全球化”的趋势，但中国引进传播学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了。美国传播研究早年大致有两个学术范式，一是在芝加哥大学，一在哥伦比亚大学。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专著《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探讨湖南攸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的司机群体（简称“的哥”，即开“的士”的“哥儿”们）的传播行为。她未必着意承续芝加哥大学的海外香火，但她的研究与芝加哥大学的旨趣竟颇多暗合，在目前中国偏枯而化约的传播研究圈中，这样的“异类”是富有深意的。

从“一战”到“二战”期间，美国社会历经大规模工业化、都市化和移民的洗礼，社会结构和道德基础丕变，影响深远的“进步运动”应运而生。芝加哥大学的都市社会学家观察其所在的城市变化，把它看作一座活生生的社会实验室。他们在派克（R. Park）的领导下，接受杜威的实践主义

(pragmatism) 为指导思想，走出一条与欧陆哲思玄学不同的道路，而开辟了实际下田野观察的经验研究，他们的关怀（包括媒介和人际传播在社区整合的角色）充满了温和渐进改革的精神。“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国力如日中天，传播研究的重心从中西部转移到东岸，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系为枢纽，学术领袖是默顿（R. K. Merton）和拉扎斯菲尔德（P. Lazarsfeld）。他们以结构功能论为依归，研究旨趣在于维持既有系统的稳定，持盈保泰，以致学术精神转趋保守；同时，他们宗奉实证主义，研究技术（尤其是问卷调查）越来越细密，视野却愈来愈狭窄，斤斤计较的是媒介的短期效果，而对于媒介结构、组织与权力中心的复杂关系则置若罔闻。

这两个社会系早已各自往别的方向走，传播被全国各地兴起的新闻传播院系收为版图。但无论从哲学思想、研究旨趣或方法技术来说，哥伦比亚大学因缘际会，逐渐凌驾于芝加哥大学之上，至今仍是美国传播学的主流范式，历久不衰。20世纪70年代，欧洲激进派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先后被引进美国，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张本，把美国主流传播研究攻击得体无完肤。但美国毕竟是世界最大的学术市场，自成不假外求的体系，欧洲的挑战未能动摇哥伦比亚大学范式在美国的支配地位，其流风余韵更扩散到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国学界似乎也多在这个影响圈内亦步亦趋。

芝加哥大学的范式纵然在传播领域退隐为暗流，但从未完全失传。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各种要求变革的势力风起云涌，改革派学者回到芝加哥大学范式寻找血脉，重新发现先驱者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芝加哥大学的范式比哥伦比亚大学的范式更能接通欧洲思潮，提供切磋琢磨的空间。其一，芝加哥大学虽然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与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以后的左派观点立场大相径庭，但两者的主题意识都扣紧了媒介和权力的互动关系。其二，芝加哥大学先驱学者米德（G. H. Mead）发展的“象征互动论”，允称美

国文化研究的佼佼代表，和欧洲传进来的现象学也有些曲通幽径之处。

丁未熟稔西方的理论，又注意中国的语境，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她反映中国的变化，理论渊源却回溯到芝加哥大学范式，甚至更早。古典社会学的基本关怀，即如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 Tönnies）在18世纪末所揭橥的，就是探讨工业化促使 Gemeinschaft（有机乡土社会，英译为 community）转化为 Gesellschaft（机械都市社会，英译为 society）的过程。后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观察社，1948）曾援引这组概念，并译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借以对照中西社会结构的差异。质言之，维系礼俗社会的基础是依赖血缘、地缘、传统、友谊这一类亲密关系，而法理社会不以沾亲带故为主轴，人际关系必须靠法律和契约来约束。这是“理想型”（ideal type）的概念建构，一脉相承，深刻影响了古典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传播学滥觞时期便曾想象媒介具有万能魔力，可以长驱直捣 Gesellschaft，逐一击破“乌合之众”社会（mass society）里的疏离分子，但这个理论早已被修正得面目全非了。

社会学这个古典关怀历久弥新，丁著与它有两个重要的联系。第一，她的个案来自湖南攸县在深圳开出租车的边缘群体，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滋生的特殊风貌。这些司机群体到了扰攘的都市艰苦谋生，为了减少风险，理应逐渐适应新环境，以职业伦理和法律契约为行为准则，实则不然。芸芸众生，离乡背井，身处异地，面对陌生的外在环境，心里有高度的不确定感，更需要和“熟人”抱团取暖。因此，他们依靠乡土社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凝聚向心力，维系感情，建立信任，对内互助团结，与圈外人老死不相往来，发生纠纷时更是同仇敌忾。他们不啻在冰冷机械的都市边缘，复制和建构难割难舍的乡土关系网络；纵使生活方式改变，旧有的“关系逻辑”还继续支配着人际运作。这样说来，Gemeinschaft 与 Gesellschaft 不是静态对立，而是在 Gesellschaft 的生活场域里嵌入 Gemeinschaft 的社会关系，两者交叉同时并存。第二，异乡

边缘人能在都市角落移植乡土关系，归因于现代传播新科技 ICT（包括手机、互联网、IP 电话、车载通信设备）的赋权起了关键作用。作者说：

ICT 已经完全融入城市流动人口细微的日常生活，包括内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乡村社区与城市社区跨地区的联结；同时也融入他们的职业场景、与城市外部世界的接触与碰撞，等等。

在此，我们有必要强调：从理论的角度来说，传播新科技不特是信息沟通的平台与触媒，更是塑造、维护和强固身份认同的动因（agent）；而“传播”是具有物质基础的主要社会现象（phenomenon），不是无足轻重的附丽或寄生现象（epiphenomenon）。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communication 其实包含三层意义：一是“沟通”，在拉丁文中与 community 同源，即建立感情与意义的“共同性”；二是“交通”，工业化以后出现快速便捷的现代交通工具，既扩大了人们沟通的距离，却也稀释了沟通的内容；三是“传播”，及至无远弗届的大众媒介成为生活的重心，更打破了时空的藩篱，比“交通”更扩大沟通的能力，但更进一步稀释了沟通的内容。丁未描写栖身于深圳的攸县群落（第四章），栩栩如生，其轨迹竟与上面这三层意义若符合节。在改革开放前，攸县那些种田的乡下人信息封闭，只能靠“捎口信”和外界接触；后来，随着经济改革的大潮席卷，有些年轻人开始出外闯天下，干起运生猪拉煤到沿海城市的营生，回程兼做别的生意，赚到钱陆续添购电视、传呼机和手机带回乡下，于是散播了乡下人对外界产生好奇的“细菌”；等到那些司机眼界大开，便像接力赛一个拉一个，连不会开车的亲友也忙着去学开车，他们就这样先后纷纷落脚到深圳，而且统统以开出租车维持生计。他们形成一个具有内聚力的自足群落，还使用 ICT 塑

造丁未所说的“空中共同体”，这才酝酿出本书那些曲折有趣的故事。看来这些“交通”司机，用最先进的“传播”科技，最想“沟通”的，转了一大圈，还是回去招呼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同乡人。靠 ICT，他们提供交通信息，宣泄平日心里郁闷，万一开车出了事“一呼百应”守望相助，有的更进一步组织社交和经济活动。话说回来，若只顾向自己人取暖，却阻碍了融入当地社会的步伐，日子越久越会憋出“无根”的疏离感。

（二）

《流动的家園》是传播社会学的杰作，出版后将为华文文献建立一块里程碑。用我自己的话语来叙述，丁未把“地方经验”提升到“全球理论”，从容出入于宏观、中观和微观之间，一方面以小见大，一方面从“文化的特殊性”联系“理论的普遍性”，进而提供与西方文献平等对话的基础。世界上，大概唯有自认为纯粹的实证论者（加上“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糊涂人）才敢妄信，社会科学犹如自然科学，其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大致来说，倘若自然科学超越国界，人文应当具有比较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而社会科学则必须平衡文化的特殊性与理论的普遍性，把这个辩证关系拿捏得恰到好处，不要向任何一头过度倾斜。丁未以韦伯和现象学这一路的方法看问题，不同于一般形式主义者，她没有把问题本质化或简单化，没有把因果关系说得太绝对、太死或太抽象，而是以浓墨重彩刻画部分与整体的有机联系，聚焦于日常生活深层结构“常”与“变”的动态过程。

丁未以第一人称行文，读起来非常流畅而亲切。一定有人会批评她犯了“主观”的大忌。但现象学的第一要义，根本就是反对把“主观”和“客观”拦腰截然两分，而是提倡“互为主观”（intersubjective），也就是由不同的阐

释社群对于一些事相赋予不同的意义，然后彼此求同存异，以获得沟通式的理解。解释不同，绝不意味着完全无法沟通或理解。丁未会听故事，会说故事，进得去，出得来。这里，我想起苏东坡“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名句；丁未收集零星星的小故事，重新编织一套完整的大故事，过程中不断游弋于几种可能的架构，最后选取最合理、最恰当、最服人的解释。若换以学术语言来表述，她必先设身处地深入研究对象（现象学称之为“社会演员”）的生命世界，了解里面所蕴藏的各种直接经验，这是剥开第一层意义；然后她又跳出那个圈子，把这些人的原始经验提炼为学术概念、意义、洞见和理论，这是剥开第二层意义。现象学的“双层解释”和实证论的“单层解释”是迥然异趣的。

剥笋见心，呈现了简单的深层结构，但其层层意义互相联系，既丰富、复杂又矛盾。好的学者如同飞舞于花丛之间采蜜之蜂，穿针引线，又借助理论视野的烛照，当学者把研究对象的直觉经验化为系统知识时，应该比研究对象更能居高临下，更能掌握全局，乃至见其所未见。然而学者切忌天马行空，不许信口开河，以至于被研究对象斥为“离谱”。学术研究是学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过程，也是学术社群与证据不断对话的结果。捧读本书，无法不感受到丁未的生命跃动，而透过她的耳目和笔端，我们跟着揣摩那群“流浪者”如何构筑他们生命的意义。丁未建构的故事不可能是唯一的版本，但我相信是比较可信可读的版本。

我提倡“地方经验”与“全球理论”的联系，容我在此略为申述一下。任何研究都必须在语意学家所说的“抽象阶梯”上下来回游走，企图找出勾连具体经验和抽象理论的最佳点。社会科学不是中国固有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是自外国接枝生长出来的，我们向外国学习构思的理路、概念和分析方法，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倘若放弃文化自觉，“先验地”拿一个现成的外国理论当标准答案，然后在华人社会拼命套取经验印证——请问何必如此大费周

章，而又自动缴械？我完全赞成丁未所采取的韦伯式现象学的路径，一切认知、题旨和问题意识先从华人社会的生活肌理和脉络入手，寻找出重大问题的内在理路，然后逐渐提升抽象层次，拾级上升到一个高度，自然会与整个文献（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直面对接，这时我们站在制高点取精用宏，有意识地选择最适当的理论。很少理论可以直接拿来套用，许多理论必须再造，有些理论表面上看似矛盾，其实在不同条件下可以互相参照补充。万一现有的理论都无法解决问题，学者可以试图自创一个合适的理论，但那显然不是简单的事了。

走笔至此，这个取径还有几个特点必须说明。第一，19世纪德国史学泰斗兰克（L. von Ranke）说：“从特殊性出发，我们可以拾级攀登到普遍性；但从宏大理论出发，我们再也回不去直觉地了解特殊性。”兰克的话切中肯綮，社会科学结合特殊性和普遍性，甚至从特殊性去了解普遍性。第二，我们反对西方理论的霸道，也反对华人封闭的文化民族主义。说到底，社会科学的旨趣是要解答母社会的核心关怀，虚心学习西方理论，是为了帮助我们活络思想或勾勒材料，不是为西方理论写一条无关痛痒的注脚。我们当然要提倡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研究，知己知彼，道理还是相通的。第三，我提出的“全球理论”，当然不限定是欧美理论，理想状态应该是各文化观点不断平等对话、竞争和修正的辩证过程。我们一方面努力学习（learn）西方理论，一方面淘汰（unlearn）纯粹是西方本位的理论；尤其，哪天我们拿得出学术业绩，足以和西方学界共同“再学习”（relearn），那么理论的创新便指日可待。经过这样反复切磋修订，理论的概括力、包容性、解释力必会大大提高。我要强调：上面说的是“正反合三部曲”，必须永不歇止地唱，周而复始，止于至善，这才是打造“全球理论”的真谛。现象学提倡“诠释社群”之间互为主观的理解，无论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正好为华人学界争取“主体性”提供自主的空间，

其精微的含义尤待有识之士阐发。第四，我们千万不能把华人文化圈本质化，更不能定于一尊，而必须容许甚至鼓励内部的异同，但合而观之，的确提出一个与“西方”（必须再进一步分疏“西方”）有同有异的文化视野。这是需要几代人努力不懈的，但至少是值得尝试的方向，丁未的著作也证明这是可行的道路。

（三）

《流动的家園》是典型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以小见大，中国成语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又说“尝一脔而知全鼎”，西方夸张的文学笔法也说“一粒沙看世界”。这些形象鲜明的描述说明：解剖一个个案，是为了了解深层结构，抓“典型”，从中细绎出特有的洞见和层层叠叠的意义，这是人类学和文学批评擅长的方法，也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特别重视个案分析的缘故。个案研究之所长，不在于“人口的概括性”（population generalization），而在于“概念的概括性”（conceptual generalization）。即使有人研究中国其他都市或其他群落，与丁未的经验证据不尽相同，甚至获得相反的结论，也都无关宏旨，因为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丁未所使用的分析概念和架构（例如地缘、血缘和传播科技的互动）提供了一双观察锐利的眼睛。人类学家格尔兹（C. Geertz）研究爪哇岛和巴厘岛的农业生态时提出“内卷化”（involution，内地通译为“内卷化”，意义稍异）的概念，卡多索（F. H. Cardoso）从巴西的政经发展史中提出“依赖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的概念，李普曼首发其端指出新闻媒介和记者通常凭“刻板印象”（stereotype）了解外在世界，这些概念的影响力远跨学科和领域。例子很多，举一反三，毋庸辞费。

除了“以小见大”，丁未自称接受新的社区研究启发，要“以大见小”。

她强调“外部世界如何投射于局部”，“通过微观社会如何被宏观系统结构所形塑，试图探索微观社会的宏观基础”。这在第三章的《黑白世界：权力与资源的关系网》中充分表现出来，也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自从中国被编织到国际经济分工的新秩序，成为世界工厂以后，大量内地农村人口奔向沿海，这些流动人口在都市边缘谋生，必须靠廉价上网才能有效和老家、外界联络，然而多头牵扯的官僚体系因循苟且，在资源配置上一味偏袒地方的权势者，照顾不到社会底层的需要，因此出现了少数合法的“白网吧”和多数违法的“黑网吧”。只要有利可图，有社会需求，自然有人肯冒风险，因此“黑网吧”禁归禁，春风吹又生。这里面涉及公权力的运作、腐蚀、回避和颠覆，也涉及公权力与人情关系的相生相克，丁未的分析丝丝入扣，最后落实到关系网上面。全球化的触角无形无声，影响到遥远的深圳某个边缘角落，虽然这些人茫然不知；国家政策和公权机关遇上“前现代”的人情因素，便产生了丁未所说的“黑白世界”：

在那些黑、白网吧的背后，其实有着一张错综复杂的权力之网，而且这张网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再到社区，一直延伸到像石厦村这样的民间最底层。

这样生动的描述何止“从大见小”，也是“从小见大”，简直是交光互影了。全球化、国家、权力、资本、阶级、职业、个人、家庭、乡情、传统、现代，如何解读这盘复杂矛盾而曲折多致的拼图？丁未绝对无懒可偷，无简单而现成的理论可套，只能另辟蹊径，从政治经济学、经济人类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的交叉界面，以娴熟的绣花针法，编织出一幅细致而深刻的图景，既提供微观的宏观基础，也引领着接下来几章的微观分析，首尾呼应，构成全书最有原

创贡献的篇章。对我来说，这是联系“地方经验”到“全球理论”的成功例证。

在中国社会，想要研究边缘群落，如果不被接纳为“圈内人”，必将不得其门而入。要成为“圈内人”，必须攀关系；要攀关系，必须先“搞熟”。据我所知，丁未花了两三年培养交情以后，研究对象才慢慢肯开口，处久了芥蒂渐失，有的引以为友，有的更是珍惜有机会和丁老师探讨人生。一旦不生分以后，丁未可以上门做客、拜年，互约吃饭倾谈，司机停在路旁向她吐诉辛酸。最神奇的是人家愿意和她分享“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私密资料——包括网上留言，对讲机号码，手机短信，手机通信记录，给公司的建议书，甚至涉及婚姻龃龉的通信。若非获得充分信任，焉能录得这些人微而毫无戒心的谈话，焉能完成多次的问卷调查？我怀疑丁未是扫除资料的“清道夫”，过后片甲不留。更重要的是她从“圈内”跳到“圈外”，赋之以学术意义，把才华和功力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做田野工作的过程中，学者应该如何自持？学者和研究对象如何保持互信而不逾矩？学者是否可以隐藏身份？学者如何妥善使用田野记录，才不辜负对方的信任？美国人特别讲究“专业界线”（professional boundary），公私之间刻意保持适当的距离，美国社会学学界近年来对这些伦理道德的问题高度重视，但争论不休（<http://linguafranca.mirror.theinfo.org/9711/9711.allen.html>）。由于中国是人情社会，以关系为重，交情就是信任，社会底层普遍缺乏隐私的概念，更难得有著名教授肯前来关怀他们的弱势处境，所以群己之界和美国很不一样。这种文化差异，也许无关对错，但人情如何影响伦理关系的界定，如何影响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作者倘若以亲身经历提出深刻反思，另写一篇长文加以阐发，对跨文化研究当有重要的贡献。

丁未研究的“的哥”们学历普遍不高，但民间话语活泼鲜跳，掷地有声，

充满了生命智慧。我最感兴趣的例子是：攸县司机家庭多摆有观音和关公的雕像，每天上一炷香求保平安，但仅仅几步之遥的杨侯宫终日香火不断，他们却从来不去，甚至不知道，因为“那是他们的观音”。丁未接着说：“可见，在他们的眼中，连观音这尊佛像都有地域之别。”我读到这一段，不禁莞尔失笑。中国人的直觉智慧了得，意简言赅，意在言中，甚至意在不言中，三两句话就搔到痒处，但往往只道出结论，却不太交代中间推论的过程。西方社会科学必须结合概念、逻辑和证据，环环相扣，缜密推论，绝对不能随便跳跃，不能大而化之，这种习惯对中国人可能是比较陌生的。两种不同的思考和语言方式各有利弊，如何接通并融合它们，就像学者如何把一般人的“自然言语”化为系统的“学术语言”，都是中国学人的共同挑战。丁未在这方面的成功也是可观的。

我和丁未结缘已届十年，她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有机会获读若干单篇。今承其好意，要我写序，固辞不获，谨以此文权当读后感，聊表贺忱与敬意，并以“先读者”的身份力荐本书给同好。

目 录

- 序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关于都市
“流动家园”现象学式的
传播考察 李金铨 / 1
- 绪论 空间、社群与 ICT / 1
- 第一章 社区传播生态：一幅“混搭”的
媒介地图 / 45
- 第二章 草根的另类媒介经营 / 95
- 第三章 黑白世界：权力与资源的
关系网 / 123
- 第四章 “空中共同体”（上）：“一呼百应”
时代的社会关系网 / 167
- 第五章 “空中共同体”（下）：核心关系圈
的形成与信任的变迁 / 213
- 第六章 流动中的家：ICT 中的家庭与
婚姻 / 248
- 结语 认同的力量 / 295
- 参考文献 / 314
- 附录一 对本书第一、第二章研究
方法的说明 / 327
- 附录二 对本书第三章研究
方法的说明 / 344
- 附录三 对本书第四、第五章研究
方法的说明 / 354
- 后 记 / 374

第一节 引子

出租车司机可能是每个大都会城市中最有故事的一群人。美国学者格雷厄姆·郝吉思（Graham R. G. Hodges）还特别写了一本《出租车！纽约市出租车司机社会史》。他从报刊书籍中收集了 30 多件出租车司机本人的著述，通过历史事件和个人经历，描述了自 1907 年第一个使用计程表的出租车出现在纽约市街头以来，这群驾车的城市流浪者走过的整整 100 年的历史。

这是一群有趣的人，他们大多见多识广，在出租车紧凑局促的空间内，的哥和乘客间可能发生短暂的亲密，人生经历、政治观点、生活哲学、爱情故事无所不谈，从而演绎出人生百态；这是一群孤独的人，他们与流动的乘客之间

* 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即信息传播技术。